

榮教授爲升等 力拚學術戰場

【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】大學校園內，年輕教師是一批批剛出校門的學術新鮮人，等待著他們的不是繽紛彩紙與熱情期許，剛脫離學生身分，從台下到台上，他們馬上變身成為「學術神鬼戰士」，被繁重的教學與研究壓得喘不過氣，為了幾年後的「續聘」而拚命。

台灣高等教育規定教師升等的考核機制，制度內出現了不少瑕疵，許多剛踏入教職的年輕助理教授因此背負了沉重的壓力。翻開各校的升等規定，一位教師準備升等前，必須在教學、研究與服務上達到某種水平。

升等負荷重 公私有別

以國立中正大學為例，教學依據過去幾年的教學評量表、授課時數是否達到標準，以及是否獲頒教學類獎項來評分。服務方面則是教師參與學校各級會議的狀況、擔任在職專班教育推廣職務、其他招生相

關職務。

最後一項的研究評量，除了比重高達75%的專書著作審核之外，其他25%則由教師執行的研究計畫及研究獎助次數來評分，例如獲得國科會甲類研究計畫一次可得5分，而研究則佔了總評分的60%。

一位助理教授每學期最低必須負擔8至9學分的教學工作，私校與公立學校又有差別。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指出，中正的助理教授雖然要負擔9學分教學，但只要手上有研究計畫或指導研究生，可免一學分。私校教師的工作卻相對繁重，雖然也是差不多的學分數，但一門學科只有2學分，也就是說，一個有10學分的老師，得上5門課。

管中祥表示，5門課各不相同，備課時間、做研究、指導學生其實已佔據一個教師大半的生活。雖然某些

私校對面臨升等的老師提供不少優惠，以世新大學為例，就讓即將升等的教師有半年免授課的福利，專心準備升等。但也有不少學校壓迫老師同時提供教學與



研究，卻不管老師是否能夠負荷。

教研不分類 老師好累

其實，升等評鑑並非一直都存在，早期的教師升等只重年資，缺乏客觀評鑑學術著作的機制，為了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準，逐漸發展出升等評鑑，增加「助理教授」這個分級。

1980年代，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教授黃厚堅曾研究教師升等評鑑辦法，提出各級教師的個別任務，報告中指出，「大學教師固宜在教學、研究、服務三方面皆有良好績效，但三者對於不同級職教師有不同重要性。教授級者偏重研究功能；講師級教學更較具重要性。」

反觀目前的升等制度，卻「重研輕教」教師無法投注更多時間到學生身上，師生關係逐漸疏離。國科會的研究計畫必須在12月提出申請，許多老師得在8、9月準備。管中祥說，這期間正好是學校開學，老師得教學、研究蠟燭兩頭燒，如果為了升等，勢必得放棄部分教學品質，犧牲學生受教權侵害是必然結果。

重研輕教 扼殺知識分子

制度問題讓教師與學生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。政治大學勞工所教授劉梅

君表示，年輕教師被迫關在研究室，失去與學生互動的機會，缺乏機會參與公共事務，這種重研輕教的制度，嚴重扼殺了這一代的知識分子。

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王增勇認為，要求教師拚研究與投稿量，以其做為評量教師的單一標準，害慘了教師與學生，更戕害公民社會，偷走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機會。

管中祥也認為，政府投注許多資源培養這一代的知識分子，但當他們成為教師後，卻因為制度把他們綁死在校園內，導致他們對社會沒有回饋，阻礙社會進步。

教授參與社會議題不會被列入「服務」項目評分，因此多數教師轉向接研究計畫，或替企業、政府背書。劉梅君感嘆：「因為價值與價格是不同的，雖然參與社會議題有其價值，但這個時代只重價格，沒有價格的事很少人想做。」

當校園內越來越寂靜無聲，研究成果越堆越高時，台灣的高等教育，會造就出什麼樣的下一代知識分子？劉梅君語重心長表示，知識分子發現社會問題，介入、討論，甚至透過各種方式推動改變，是令人興奮的事，但現在的大學教師卻沒時間做這些真正重要的事了。